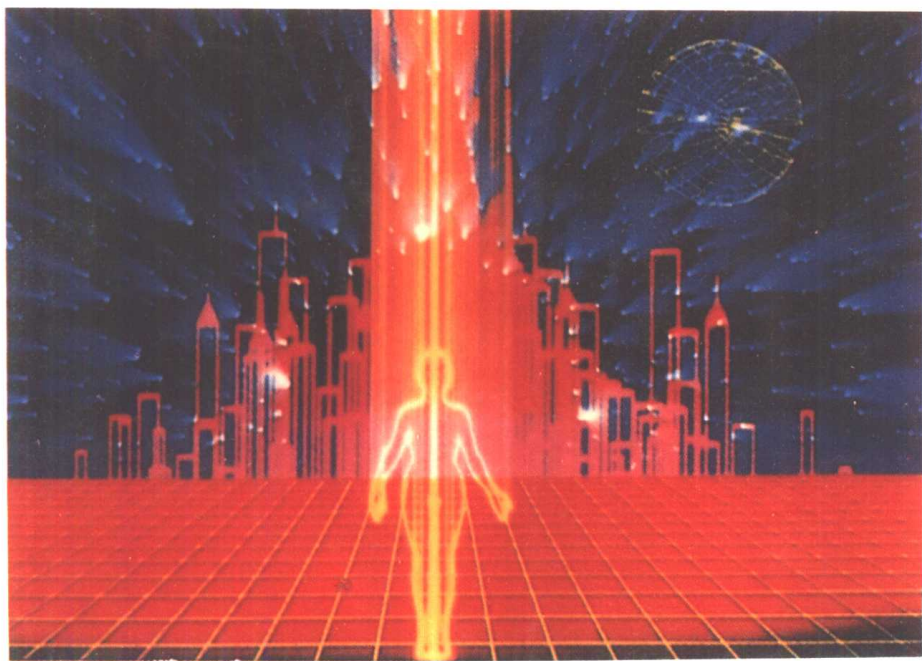


人口控制辨析论



马赢通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人口控制辨析论

马瀛通 著

科学出版社

1996

(京)新登字 092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通过对人口控制中的焦点问题辨析,论述了我国面临的出生高峰的特征及对策,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课题成果。书中简要回顾了我国第一、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并根据中国第三、四次人口普查和 1988 年中国 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等全国性调查资料,分别对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育状况与潜在出生趋势做了具体分类比较分析,深层次地揭示了全国面临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特征,尤其是对国内外关于我国 80 年代以来有关人口控制的若干主要学术观点与结论,著者不仅提出了质疑而且还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独到见解和科学论证。这无论是对理论研究者、决策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能起到解放思想、启迪思路、审视过去、把握现在和预测未来的积极作用。

人 口 控 制 辨 析 论

马瀛通 著

责任编辑 尚久方 何伟华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3/4

印数:1--1500 字数:200 000

ISBN 7-03-004146-1/C·31

定价:14.00 元

前 言

“我国面临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特征及其对策”是著者主持的“七五”期间一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本书是著者根据这项课题的独自研究成果写成的。

本书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增长变化，简述了人口控制思想与实践的曲折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首次明确提出了人口出生高峰的概念、形成原因与二次人口出生高峰的界定依据，略论了第一、二次出生高峰并强调指出它们与面临的第三次出生高峰的质性差异。

本书主要从妇女婚育模式、年龄结构变动、生育度量指标等人口学因素出发，对面临的这次出生高峰的女性初婚比例构成状况特征、初始生育年龄段生育率抑制与反弹特征、出生孩次比例构成变动与总和生育率指标变动间的矛盾性，以及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年龄分布与构成变动特征等诸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对选用不同指标分析80年代生育现象所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做了反反复复的探索，历尽艰辛才解开了不同指标导致的相互矛盾结论的症结所在，揭示了从1983年起至80年代末之前的妇女平均终身预期生育水平：多数年份是升非为升、降非为降，基本呈相对稳定的质，以及婚育模式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期生育控制型逆向转变为早期生育控制型的质；指出了受其影响，整个90年代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面临人口控制任务的严峻性、艰巨性和不稳定性。

始于1986年的全国出生高峰预计在本世纪末结束。然而，此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出生高峰强度和出生率变动态势却大不相同。上海、北京早在1986年前，就已无出生高峰而言并

转向峰谷了。为了客观而清醒地认识无法改变的年龄构成变动对出生量的影响；为了便于各地间的比较；为了科学地了解哪些地方出生率回升是合理的，合理地回升幅度有多大以及何时停止回升；为了识别哪些地方出生率不应回升，哪些地方应下降以及降低幅度；为了在相同条件下分类比较并判别哪些地方出生率应较为近似，哪些地方与哪些地方根本不可比；特以 80 年代中期全国婚育模式为标准，按潜在出生“峰度”从低向高的顺序排列，将出生“峰度”接近的划归为同类地区。这样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被划分为七大类地区。这种划分法无论是从“峰度”度量指标的选取，还是从分类划分的可比性及准确性来说都是首次。毫无疑问，这将对宏观分类指导及客观地认识人口计划有重要参考意义。

根据全国第三、四次人口普查及 1988 年全国 2‰ 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本书首次对 80 年代历年人口自然变动进行了评估，并以简便而可靠的方法进行了推算，从而对重新认识 80 年代人口控制与科学认识面临人口控制问题奠定了基础。

本书首次提出 80 年代的一孩比例上升，主要是受早婚比例上升、晚婚比例下降的影响。多孩比例与一孩比例因同属构成比关系，所以多孩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一孩比例上升影响所制约。须强调指出的是：全国各地的一孩比例上升与多孩比例下降成因不同，决不可一概而论。然而，从全国看，一孩比例上升与多孩比例下降，却万不可误作是 80 年代计划生育工作与人口控制成效的标志。

本书明确提出了两个起点大为不同的 70 年代与 80 年代生育水平不具可比性。全国各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分类与排队，是在不同等条件下做出的。因此，不具有横向间评估计划生育工作成绩大小的可比条件。评估一定时期内不同地区的生育控制水平及控制成效，须使其同质条件尽可能相似，须以原基础为参照，决不能简单到单凭某个指标数值高低，就来盲目分类排队，简单评估，

草率下结论。

本书通过比较分析，给出了反映1979年计划生育工作的1980年主要五项指标。这些指标充分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在原基础上已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水平下降的奇迹。揭示了这种奇迹的创造，只是“晚、稀、少”政策的初步成效。与政策要求相比，远未达到政策规定的限度。

“晚、稀、少”政策在几经周折后，又在广东等省区农村实施。从与其有可比性的数据看，广东控制成效相对突出，生育水平下降十分显著。若不受外界政策规定差异对群众产生的担心政策收紧的影响，效果会更加明显。

“晚、稀、少”政策对今天的中国多数农村地区*来说，仍是高标准、严要求。对控制水平已低于“晚、稀、少”政策规定的少数农村地区来说，当然也没必要在要求上与其他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全国各地差异很大，各地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既不能搞“一刀切”、“二刀切”或“三刀切”，也不能搞齐步走。只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别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提出各自相应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控制目标及其措施，才能异曲同工、协调发展。

本书通过大量的背景资料与数据研究，揭示了政策不稳定的根本起因是：1980年工作中，不顾城乡差异仍然很大这一条件而实施农村一对夫妇也只准生育一个孩子。这种不分城乡差异，把农村中提倡只生一孩当作只准生育一孩加以推行的做法**，使计划生育工作从此陷入被动。行政式的突击工作普遍从此开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多数农村地区改观不大。急于求成、急

* 这里指的多数农村，不包括少数已低于“晚、稀、少”生育水平的农村地区，本书凡涉及于此的，都不再另加解释。

** 党中央、国务院从未提出在农村一对夫妇终身只准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因急于求成而被有的同志以行政手段等在农村推行为只准生育一孩。本书凡涉及农村只准生育一孩的地方，则不再另加说明。

功近利，使人口控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80年代初的急于求成负作用，充分说明了80年代中期党中央对农村生育政策加以完善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没有80年代中期农村生育政策的完善，就不可能有80年代后期至今抑制这种负作用影响所取得的成绩。

本书针对80年代人口控制中的问题及其对面临的出生高峰影响，通过政策与执行效果研究，通过人口计划对人口增长控制的要求以及现行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的不适应状况分析，针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提出了90年代人口控制对策建议，尤其是提出了抓计划生育科学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的思路及理性框架、可操作方案与方法。其中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科学管理的系统概念。论述了基层基础工作与宏观一体化的信息管理、微观与宏观人口计划指标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管理、乡级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站管理、计划生育职能部门管理、管理中的统分结合分层综合治理，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抓机遇等一系列问题。

人口过程实质是一社会过程。人口控制是一定科技文化、一定特殊历史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控制。经济因素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改变不了人口控制的社会属性。经济因素虽是这一社会控制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却只有相关关系，而决没有因果性的决定关系。我以为，只有当社会进步到人们普遍脱“穷”，把提高孩子素质作为普遍要求时，孩子抚养成本的考虑才会成为对多育自我约束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书力求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不同的问题，但鉴于某些问题的交叉性，文中在若干地方不得不做些必要的重复。然而，作为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其主要成果可以说是既没有重复别人也没有重复自己，在国内外都为首创。

本书与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的著者另一本

专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是姊妹篇，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

本书的问世，还得到了原中国人口情报中心张法瑛、朱隆章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及原中心的资助。本书定稿后的整理、打印又承蒙此间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苗霞、徐志昕和白银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孙兴武等同志的帮助，尤其是本书定稿前苗霞同志就对策部分提出的宝贵建议，使著者受益匪浅。著者值此书出版之际，再次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为此书问世付出劳动的科学出版社同志道一声辛苦了。

此书通篇力求使复杂的学术研究问题简化成通俗易懂的问题，以飨各层次读者。至于此书的科学性及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那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马瀛通

1994年1月，北京

目 录

引言	(1)
一、出生高峰与出生高峰划分	(4)
1. 出生高峰	(4)
2. 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划分根据	(5)
3. 计划生育控制下不会复制出未来的新出生高峰	(6)
4. 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	(7)
5. 1959—1961 年困难时期人口自然变动	(11)
6.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	(12)
二、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前的十年婚育变动	(20)
1. 前五年与后五年令人吃惊的妇女初婚构成比变动 差异	(20)
2. 1976—1980 年与 1981—1985 年的前后两个五年人口自然 变动明显差异	(22)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正确认识计划生育、指导人口控制的指南	(27)
四、我国面临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特征	(32)
1. 出生高峰持续时间长特征	(32)
2. 女性初婚构成比现状特征	(33)
3. 初始生育年龄段生育率的控制与反弹特征	(37)
4. 总和生育率与孩次构成比变动的矛盾性特征	(55)
5. 育龄妇女数变动特征	(62)
(1) 育龄妇女总数在四个五年期间及其历年的详细变动	(62)
(2) 全国生育旺盛及较旺盛年龄段生育率与妇女数构成变动 特征	(64)

6. 1986—2000 年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三个分年龄段历年妇女数基数比变动分类 (71)

第一类地区：沪、京、津、辽、浙二省三市 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71)

第二类地区：冀、吉、粤（含海南）、鲁四省 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79)

第三类地区：黑、晋、内蒙、陕四省（自治区）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85)

第四类地区：苏、鄂、湘三省 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91)

第五类地区：闽、桂、藏三省（自治区）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96)

第六类地区：豫、宁、赣、青、滇、新六省（自治区）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101)

第七类地区：甘、川、皖、黔四省 1986—2000 年三个分年龄段妇女数基数比历年变动 (109)

五、滑坡与抑制滑坡的 80 年代 (116)

1. 生育模式变动与人口增长控制 (116)

2. 80 年代全国历年人口规模与自然变动指标的基本估计 (120)

(1) 生育水平起点不同的两个十年不具有可比性 (120)

(2) 80 年代全国历年人口规模与自然变动指标的估计 (121)

3.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结果与推算结果的基本评估 ... (124)

4. 80 年代人口控制中的焦点问题剖析 (128)

(1) 生育度量指标在 80 年代人口控制评估中的矛盾现象 (128)

(2) 表征妇女终身平均生育水平的假定指标概念与特点 (130)

(3) 70 年代“晚、稀、少”计划生育方针控制下的主要五大之最	(132)
(4) 急于求成对人口控制产生的负效应	(134)
(5) 1983—1985 年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下降的内因探析	(136)
(6) 80 年代中的 1980 年与 1985 年两个总和生育率最低值形成之因	(137)
(7) 生育水平相对“稳定”、出生率相对回升的 1986—1990 年	(138)
六、80 年代生育水平比较分析	(138)
七、生育政策与人口增长控制	(154)
1. 生育政策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差异	(154)
2. 紧缩生育政策与人口控制从严并非呈正相关效果	(156)
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反思、推陈出新	(161)
1. 完善生育政策是对还是错	(162)
2. 我国生育水平下降难度在更替生育水平以下的 1.8 左右为最大	(164)
3. 总和生育率：1980 年的 2.28 与 1985 年的 2.17 的质性差异	(166)
4. 1981—1982 年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归因不是初婚变动	(167)
5. 一孩比例提高、多孩比例下降不是 80 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标志	(167)
九、正确认识人口增长控制计划	(168)
1. 怎么认识人口增长控制计划与计划完成情况	(168)
2. 怎么认识人口增长控制计划的执行情况	(173)
十、人口增长控制对策	(175)
1. 各级党委政府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	(176)
2. 提倡晚婚推行晚育	(178)

3.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到位、异曲同工	(180)
4. 靠计划生育科学管理	(183)
(1) 计划生育基础信息的科学管理	(191)
(2) 宏观与微观人口增长控制计划指标的科学管理	(202)
(3) 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科学管理	(208)
(4) 乡级计划生育服务工作室的科学管理	(210)
(5) 计划生育职能部门的科学管理	(213)
(6) 计划生育科学管理中的统分结合、分层综合治理	(216)
5. 要抓住当前的机遇敢试敢闯	(223)
重要参考文献	(232)

引 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量增长,是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20 世纪只剩下短短几年的时间,21 世纪不再是遥远的未来。在 80 年代后期生育模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90 年代前期,我国恰处始于 1986 年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峰顶,峰顶之后的出生率虽然逐年将会有所下降,但是在 90 年代的后期前,仍将要居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这是由现在的婚育模式、管理方式与此间主要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年龄结构变动所决定的。

客观上,年龄结构变动虽无法改变,但婚育模式通过主观努力却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婚育模式改变,出生率也将随之改变。在年龄结构变动客观已确定的条件下,出生率的升降幅度,关键取决于婚育模式的调控水平。

仅从主要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影响的客观因素来分类,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致可划分为七类地区。在婚育模式相同或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农村出生率从第一类到第七类将会一类较一类高。每一类间的出生率则依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前后排列顺序而加大。

1990 年 12 月 30 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今后十年,争取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2.5‰ 以内”。这是对今后 10 年人口增长控制的总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走出理想化迈入求实的坚实一步。之所以这样说,关键在于这十年人口规划总结了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充分考虑了客观实际与可能、现状与发展、工作因素与实际困难、主

观能动性与实际控制能力的可能性，遵照规律第一性，计划第二性的原则，使规划尽力建立在经过最大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基础上。具体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动差异大，现有年龄孩次构成及其性别构成大不一样，孩次出生间隔差异十分突出，加之，计划生育的计划控制能力也大不相同。因此，在具体要求上与人口增长控制计划指标上，必然差异也十分可观。

我国各地区间的人口控制水平同经济社会发展一样，也很不平衡。现时的人口发展现状是人口长期变动形成于今的反映，也是影响未来人口发展的客观基础。若不从历史发展的昨天来认识今天，不从今天的客观现状来认识明天，那就难以全面地认识人口的发展。因此，从人口发展历史的昨天、今天来剖析我国面临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特征，切实从我国具体国情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一定历史时期内计划生育条件下的人口自身控制规律，依靠综合治理来科学管理计划生育，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确保完成人口增长控制计划指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则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以最新科研成果来重新认识人口控制中的“计划”、重新认识国内与国际社会对8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水平、人口增长控制问题及其对策的一些结论，本课题研究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供决策者及学术界同行们参考。倘若此书令读者有新意之感，对昨天有新认识，对明天有新启发，也算达到了本课题研究的初衷。倘若引起了学术上的争鸣，那就达到了本研究所渴望的目的。

本课题经过对人口资料的可靠性评估，着重开发利用了1982年人口普查、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1988年全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0年人口普查部分主要数据，以及参考1982年以来的全国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等资料，先后对广西、河南、山西、江西、浙江、河北和甘肃等省区的部分农村进行了调查，重点对河北、河南各一个地区，甘肃的几个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课题从始至终都密切结合我国计划生育与人口增

长控制实践，使课题研究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

课题遵循要深入到社会实践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的原则，紧密结合实际，以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促人口基础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成果与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来不断解放思想、更新人口控制思想、更新计划生育观念、改进方法、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增强发展潜力、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与人口增长控制能力。

本课题的研究，在理论上能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开拓新思路，在实践上能使人们认识到：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行计划生育毕竟是生育制度的改革。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现已为 11.6 亿的人口中，逐步使人们的生育行为纳入有计划的规范，是我们从未遇到的新问题。

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一种新的生育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在客观与主观的重重矛盾和困难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障碍和主要危险，不是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观入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分时期、分阶段、分类别的提出不同要求与可行对策的务实问题。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一刀切”、一蹴而就的简单化分析，不结合具体实际固然不行，结合得不好也要受挫。因此，系统的、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成果，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与实践相结合、与群众相结合、科研面向计划生育工作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理论研究只论及必要性而很少顾及可行性、现实性的弊端。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增强计划生育对人口增长的控制能力，而且也是人口研究与人口学自身繁荣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出生高峰与出生高峰划分

1. 出生高峰

世界人口从1950年的25亿增至1987年的50亿。三十七年间的翻番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出现了人口出生高峰。人口年增长率，欧洲从未超过10%、北美也少见高于15%，平均家庭生育子女数，美国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欧洲与日本则还要少一些。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则截然不同。持续的高出生率与急剧下降的死亡率，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高达20%以上，60年代曾上升为24%。我国连续二十多年的人口增长率，完全与此间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相吻合。60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为25.9%，较同期发展中国家的24%还高。据分析，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降至目前的20%左右，主要归因于中国生育率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的战后人口增长率虽然远高于西方工业国家，但却未把发展中国家而是把西方工业国家的人口出生态势称之为出生高峰。1976—1985年，我国人口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年均增长率为13.18%，较比战后称之为出生高峰的欧洲年均增长率还高，而却不称之为出生高峰。可见，出生高峰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出生高峰，严格来说，是指一定人口在一定生育水平或生育水平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因婚姻生育模式改变，或因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数陡然递增并在若干年内居高不下，或因补偿性生育，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在一段时间内较其前期有较大幅度回升，较其后期也明显偏高的出生水平变动现象。习惯上称之为生育高峰的概念，严格来说，是指出生水平而言的高峰。然而，若从一般生育率观察，在一定条件下，出生高峰与生育高

峰的趋势则很近似，为此，从一角度称之为出生高峰的，从另一角度则又可称之为生育高峰。但是，若从总和生育率、总和递进生育率这类指标考虑，出生高峰与生育高峰则根本不是一回事。照此类指标分析，所谓生育高峰则仅指第一、二次出生高峰，并且第二次出生高峰的时间也仅为1962—1971年，第三次出生高峰也只能称之为是一次出生高峰而不能称之为是一次生育高峰。

2. 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划分根据

1949—1975年间，除1959—1961年困难时期外，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均高于23‰，波动于23.13‰—43.60‰之间。持续23年之久的高出生率则完全可以划归为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称作为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但是，在1949—1958年间，受死亡率逐年不断下降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除1958年外，虽然都呈提高的趋势，然而，历年却从未达25‰。尤其是此期间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是城市高于农村。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将此期间的出生态势划归为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

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特殊例外阶段一过，1962—1970年的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高于25‰，最低值为25.95‰，最高值达33.50‰。较之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显著不同的特征，不仅是自然增长率历年都高于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的历年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口出生率从1962年起城市开始低于农村。自然增长率，1971年降至23.4‰，此后又急剧降至15.77‰。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1971—1975年虽然较其之前低得多，但是较其之后又相对偏高。计划生育初始人口控制阶段的1971—1975年，是出生态势的初始转变阶段或称转变过渡阶段。为了更加有别于后来的出生态势及生育水平，而将1962—1970年和1971—1975年的出生变动阶段合并，称1962—1975年为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

我国第一、二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划分，实际是出生高峰概念内涵的广延。之所以称之为出生高峰概念内涵的广延，是因为高